

新南南合作的兴起:中国作为路径

李小云,肖 瑾

(中国农业大学 人文与发展学院,北京 100193)



摘要 “新南南合作”兴起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是在新的发展经验、新的发展资源和新的发展制度重塑下的全球发展方案。一方面,“新南南合作”继承了南南合作中不干涉内政的政治遗产,在新的全球发展时期强调尊重国家需求导向和互利互惠原则;另一方面,“新南南合作”在全球危机的背景下努力维护全球化的成果。中国已经成为“新南南合作”的主要经验路径。

关键词 新南南合作; 全球发展; 中国路径; 全球化; 开放

中图分类号:D 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17)05-0001-11

DOI 编码:10.13300/j.cnki.hnwkxb.2017.05.001

南南合作缘起于冷战反殖民主义的历史背景,先后出现了万隆会议、77 国集团、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南南合作的阵地,但是由于国际发展合作话语一直受西方主导,南南合作在其后的 30 多年中几度被搁置,进展缓慢,直到以中国为首的南方国家崛起,南南合作有了新的发展契机^[1-10]。不同于传统南南合作中发展中国家取得政治独立的经验,南方国家开始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成功发展经验——发展优先、基础设施先导、农业发展和工业化、人口的流动与减贫等,孕育了新的发展知识要素,这些发展知识要素与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取得独立的民族国家所继承的发展思想遗产有着很大的不同。与此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南方国家正在为全球发展提供新的发展资源,南方国家间的贸易、投资和发展援助都达到了新的高度。亚投行、一带一路倡议的建立和提出,南方国家积极参与 G20 会议和联合国 2030 议程为“新南南合作”提供了制度建设的保障依据。

一、新的发展经验和知识

中国作为二战后取得独立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仅用了前后两个 30 年的时间就实现了工业化和经济社会的巨大进步,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按照发展型学习的路子,在不断学习与纠错的过程中发展,既学习了先发国家的发展经验,又摸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自主性发展道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发展经验,也为全球发展贡献了新的发展知识。中国所提供的新的发展经验和知识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是农业发展,第二是工业化,第三是城镇化,第四是减贫经验。

1. 农业发展

农业发展在中国发展经验中具有基础性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土地制度,二是单位土地产量的提高。

(1)从土地改革到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度。新中国成立前,原有的土地制度极为不合理,制约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刘少奇在《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占乡村人口不到 10%的地主和富农占有约 70%~80%的土地,而占乡村人口 90%的贫农、雇农、中农及其他人民却总共只占有 20%~30%的土地,他们终年劳动,不得温饱^[11]。1950 年 6 月 28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

收稿日期:2017-04-1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西方发展援助与中国发展援助的战略政策比较分析”(16AZD017)。

作者简介:李小云(1961-),男,中国农业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发展学。

《土地改革法》，规定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1952 年底，全国基本完成土改，3 亿农民在土改中分享了 7 亿亩土地。新中国成立后的土改完成了土地的重新分配，使得土地重新回到了广大农民手中，为农业发展，工业发展奠定了不可缺少的基础，见表 1。

表 1 全国土改结束前后各阶级占有耕地比重^[12]

	贫雇农	中农	富农	地主	其他
土改前	14.28	30.94	13.66	38.26	2.86
土改后	47.10	44.30	6.40	2.20	

土改的完成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此基础上，以山西长治的农民自发探索出农业合作社经验为代表，逐渐向全国推广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成为一项国策。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的几年，粮食产量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在随后的“大跃进”的热潮中，人民公社制度成立，打乱了原本循序渐进推进的合作化运动，也随即暴露出了其弊端，不切实际的生产计划使得农民积极性受挫，在 1956—1957 年人民公社高潮后全国出现了农民退社的风潮；紧接着是 3 年自然灾害期间遭遇的粮食减产和饥荒的问题。

面对困难，中央政府深入农村调研并及时纠正问题，1962 年中共中央出台的《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指出，人民公社制度“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的规模“以二三十户为宜”^[13]。这就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原则，意味着又把农村集体经济的生产经营、财务管理权和分配权还给了最低的小队层次（相当于村一级）。人民公社制度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小队这一政策调整对农业发展带来了积极的影响，粮食增产得以继续。粮食产量由 1962 年的 1 313 公斤/公顷上升到 1978 年的 2 528 公斤/公顷^[14]。

然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调整并不能改变人民公社体制下高度“政社合一”带来的弊端，在这一机制下，农业生产中监督成本高，生产队中社员的积极性低下，导致农业生产率越来越低^[15]。中央政府开始进行又一次的纠错，而这一次纠错促成了中国发展进程中的重大变革——即 1978 年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家庭联产责任制应运而生。1982 年的中央 1 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确认“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方式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制度^[16]。人民公社制度开始被家庭联产责任制取代，农村改革推动了 1978 年到 1984 年农业高速增长（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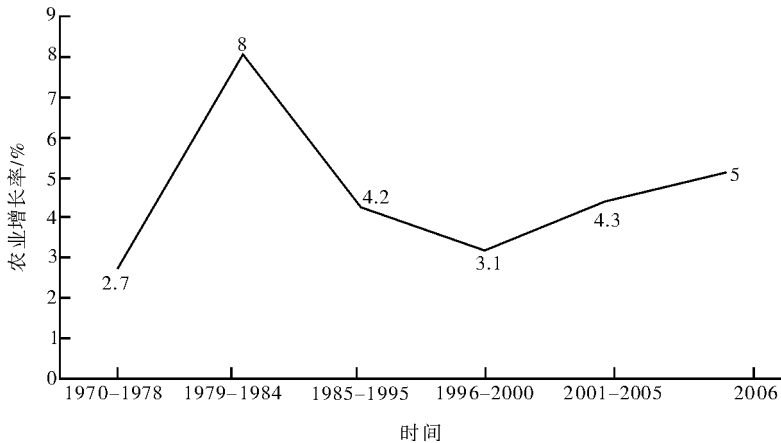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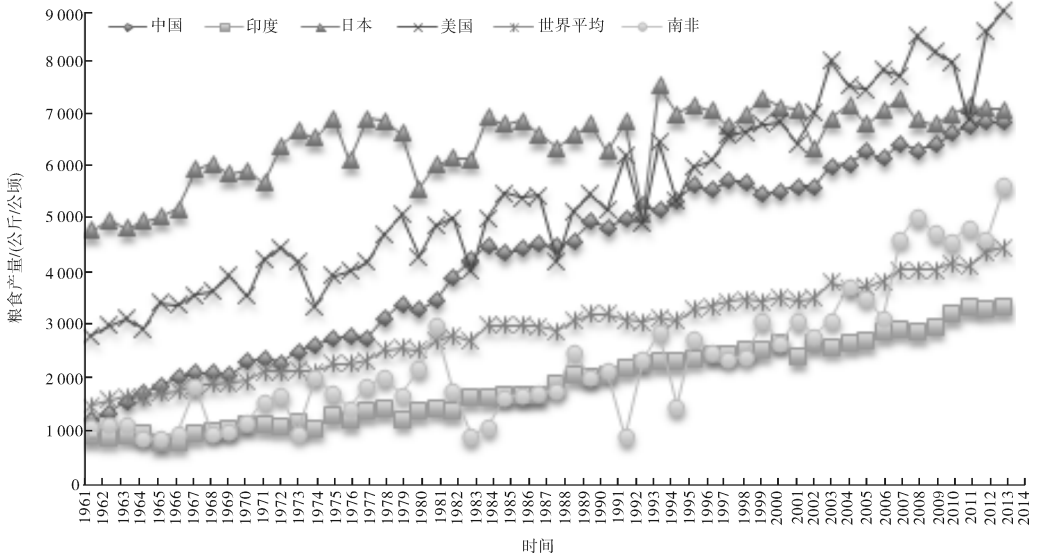


图 1 中国的农业增长率

(2) 单位土地产量的提高。中国的农业增长经验有一条基本的原则就是单位土地产量最大化原则。这一原则通俗地说也叫“精耕细作”，指的是通过单位土地劳动力密集投入来获得单位土地的最大产量。这是中国自古以来的农作方式，历经了数千年。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农业集体化运动，还是改革开放后的家庭责任联产承包制，都是建立在追求单位土地产量的基础之上的。这是中国根据自身发展初期工业基础差、耕地少、缺乏资金的现状摸索出的经验。黄宗智指出，中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和美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发展方向完全不同。中国农业的主导逻辑是单位土地产量的最大

化,而美国农业的主导逻辑是单位劳动力产量的最大化,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谷物播种面积逐年缩减,谷物产值占农业总产值比重小的原因^[17]。黄季焜认为,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均耕地少,各省的人均耕地也会随着人口的增长呈现减少的趋势,通过技术进步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是保障粮食安全的主要路径^[18]。中国的单位面积粮食产量从1964年前的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到20世纪80年代后数次超过美国,与发达国家日本、美国接近,表明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单位面积粮食产量有了巨大的飞跃(见图2)。



注: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图2 中国等国及世界平均的单位面积粮食产量水平(1961—2014)

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发展为工业化的贡献主要表现在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的方式汲取农业剩余。根据孔祥智等人的研究,1952—1997年期间,农民通过“剪刀差”的方式为国家提供12638亿元工业化资金,平均每年达到274.7亿元^[19]。

可以看到,中国的工业化原始积累正是建立在前三十年的农业发展的基础之上。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1957年),中国农业占工农总产值比重从1949年的70.0%下降到1957年的43.5%^[14]

2. 工业化

(1) 从以重工业为主到轻重平衡。与农业发展一样,中国的工业化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学习与纠正的过程。建国伊始,中国借鉴苏联的工业化经验,优先发展重工业。“一五”期间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然而随后出现的中苏关系恶化和“大跃进”的影响,使得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出现了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也出现了工业与农业比例失调的问题,进而导致整个国民经济结构的不平衡。鉴于此,中央政府开始进行工业发展的纠错。1959年,中共中央八届七中全会上通过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钢铁产量指标得到下调^[20]。经过经济调整,中国轻重工业结构失衡的局面得到改善,1962年,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占工农总产值的比重分别为33.6%、30.9%和35.6%^[14]。20世纪60年代是冷战热战的交替威胁的时代,中国周边地缘关系紧张,相继发生了“反攻大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印度支那战争。处于备战考虑,中国开始了“三线建设”,我国工业布局东西部区域不平衡的状况得到改善。但这一时期的建设项目大都为国防军事重工业,这也造成了轻重工业比例再次失调。1978年轻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1965年几乎均衡的50.4%、49.6%变为42.7%、57.3%^[14]。

为解决轻重工业发展不均带来的消费品不足和经济结构严重失调的问题,中央政府再次进行纠偏。1979年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为导向的工业化均衡发展战略。通过发展非公用经济和民间力量来推动工业化进程,通过实行“双轨制”,建立市场体系,逐步调整和平衡产业结构,侧重轻工业的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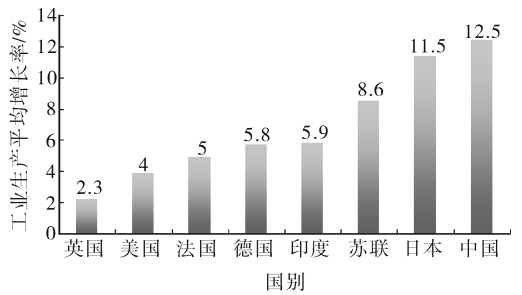
展。到 1991 年,轻重工业总产值的比例已经由 1979 年的 0.78 : 1 上升为 0.95 : 1^[21];之后,轻重工业总产值之比基本稳定在 1 : 1。

中国工业生产在 1951—1980 年期间的平均增速高达 12.5%, 高于同一时期的日本(11.5%)、苏联(8.6%)、印度(5.9%)、德国(5.8%)、法国(5.0%)、美国(4.0%)、英国(2.3%)(见图 3)^[14]。农牧业税也由 1952 年的 28%, 降至 1978 年的 5.47%^[22]。可见, 经过 1978 年以前的 30 年的农业发展带动工业化建设, 一个独立的和比较完整的中国工业体系已经初步建立起来, 为后三十年的发展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物质准备。

(2) 基础设施先导。中国的工业化为基础设施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无论在改革开放的前 30 年还是在改革开放后的 30 年, 中国对基础设施都进行了大量的投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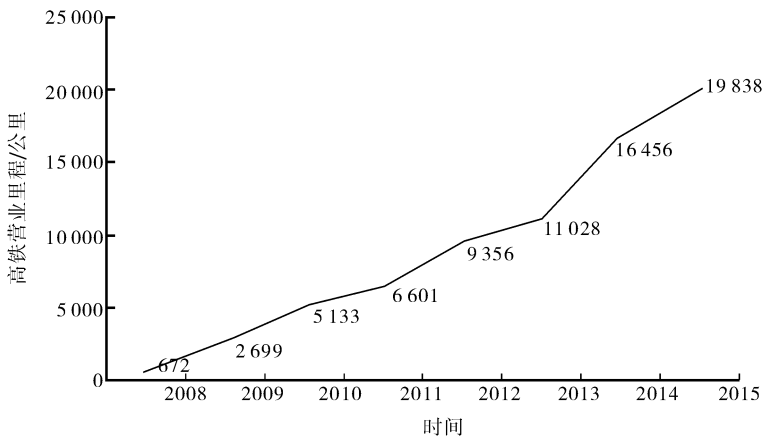
在 1949—1978 年的 30 年里, 经历了国民经济的曲折发展, 国家对全国基础设施的投入和建设仍然保持增长的势头。公路交通、铁路交通、民航航线和输油管道里程比起建国伊始都有了很大的改善和突破, 为城市建设提供了良好基础。在农村, 全国各地兴修了大量农田水利设施, 水库数量从 1949 年的 1 223 座增加到 1978 年的 84 585 座^[23], 为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抵御水旱灾害提供了坚实物质保障。农业灌溉面积由 1952 年的 1 995.9 万公顷增加到 1978 年的 4 496.5 万公顷, 其中机电灌溉率从 1952 年的 1.6% 提升到 1978 年的 55.4%^[14]。

改革开放后, 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更是进入了飞速增长时期。从民间流传的“想致富, 先修路”到中国的高铁奇迹,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 30 年实现了村村通公路, 电信和互联网(见表 2), 高铁规模更是达到世界第一(见图 4)。



注: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1981》。

图 3 1951—1980 年各国工业生产平均增长率



注: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2016》。

图 4 中国高铁营业里程

2014 年 12 月中国的高铁轨道总长度达到 16 000 公里, 位居世界第一。林毅夫等人认为, 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成功的经验离不开中国积极引进和学习国外技术, 并发展出自己的比较优势。以中国高铁为例, 中国在过去 10 年中每年派出代表团出国进行考察访问, 仅在 2006 年和 2007 年, 中国就派出了 97 个代表团共计 580 名技术人员赴德国西门子学习高铁技术。2008 年 4 月 11 日中国制造出了第一台 CHR3 高速铁路机车。林毅夫等的研究表明, 中国建成世界上最大的高铁网络的单位成本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低, 并且具有可靠性和高效性。中国之所以能够实现比较优势, 一方面得益于相对低的劳动力成本, 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国大规模的高速铁路网络规划实现了规模经济^[24]。

表2 2015年中国通信普及情况

%

开通互联网宽带业务的行政村	电话普及率	移动电话普及率	通邮的行政村
94.8	109.3	92.49	99.8

注: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6》。

3. 城镇化

中国的城镇化最大的特点是起始于中小城镇的发展,通过乡镇企业带动乡村工业化与城镇化,然后再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沿海开放城市与国际大都市。这种方式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城市化起源于城市大工业向农村社会的渗透和辐射。与农业发展、工业化一样,中国的城镇化也是在不断地纠正和调整中发展。

在这一过程中,首先推动城镇化发展的是中国乡镇企业,第一代乡镇企业可以追溯到集体化时期的在农林副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队企业。但是,受到“大跃进”、三年经济困难、“文革”、“以粮为纲”等影响,这一时期的社会企业的经营受到严格限制,具有单纯和自发性、自给自足的特点。这一阶段我国的城镇化率由建国时的10.6%提高到15.4%^[25]。

第二代乡镇企业是三线建设背景下为备战需要而建立的地方企业。以小钢铁、小煤炭、小化肥、小水泥、小机械这五小工业为方向。但是由于片面强调五小工业,没有考虑地方实际,造成许多地方的乡镇企业一哄而上,又一哄而散,这一阶段我国的城镇化发展基本停滞。

1979年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开始,国家为鼓励乡镇企业的发展出台了多项政策规定。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鼓励社队企业的大力发展^[26]。1984年起社队企业正式改名为乡镇企业,1985年中央提出发展乡镇企业是振兴我国农村经济的必由之路。这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先从农村开始的表现,至此,乡镇企业进入空前发展的阶段。1990年,乡镇企业生产总值达到8416.64亿元,占全国社会总产值的22.1%^[27]。截至1992年乡镇企业吸收劳动力超过1亿人^[28]。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逐渐深入,国有企业出现收入分配严重个人倾向、挤占流动资金等严重问题。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规定了我国要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的现代企业制度^[29]。经过不断的改革,国有企业的组织制度和经营状况不断改善。2000年国有企业销售收入增长18%,利润总额比1999年增长了3.5倍^[27]。

另一方面,国家开始推进对外开放和大城市建设的城镇化阶段,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在东南沿海先后设立了深圳、珠海等4个经济特区,随后又在大连、天津等14个沿海开放城市设立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20世纪90年代,建立浦东新区……从1980年开始,以开发区为特征的沿海地带城市经济迅猛发展,出现了外资企业聚集的以深圳、上海、北京、广州等为代表的国际大都市。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极大地促进了劳动力市场的流动,随着国家对人口流动管制放宽,农民外出就业人数从1983年的200万增加到2015年的27747万^[30],中国的城镇化率也在2011年首次突破50%达到51.27%^[31]。

4. 减贫经验

中国农业发展、工业化与城镇化的稳步发展一同为解决本国的贫困问题打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这个基础很大程度上反映在中国的基尼系数上,1978年前,中国农村的基尼系数仅为0.212,1983年只增加到了0.246^[32],这为后来推行的扶贫攻坚计划提供了一个社会结构平等的前提条件。

长期的经济高速增长是中国减贫的重要经验。中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在1978年至2008年的30年间达到9.8%,期间的贫困发生率则从63%下降到不足10%。2000年至2008年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长对于减贫的弹性高达-1.09,即人均GDP每增长1%,贫困发生率下降1.09%^[33]。

此外,农业的增长也是减贫的重要驱动。研究指出农业的增长对减贫的贡献是工业的4倍^[34]。黄季焜的研究表明农业转型的速度与农民收入的增长以及减贫有着密切的关系:农业转型越快农村减贫的效果就越大。他指出中国农业的成功得益于四大驱动因素:制度变革(1978—1984年间的土

地制度改革);技术革新(1980年代中期开始);市场改革(1980年代末期开始);农业投资(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他就中国农业转型的经验,提出了农业转型的4个阶段的衡量指标:在第一阶段,衡量的指标主要是主粮生产;在第二阶段,衡量的指标是农业的多样化(劳动密集+高附加值产品);第三阶段的衡量指标是非农就业的增加,其中包括农业+兼业非农就业,农业和非农业的专业化分工增加,农业机械化和“不在农场”(off-farm)的就业增加;第四阶段是农村城市化和城市-农村的综合发展。他认为,要实现包容性农业转型必须遵循制度—政策—投资(IPIs)的顺序^①。

与农业发展的减贫效益相比,工业化的减贫影响则更为复杂。表1显示,减贫速率在1979—1984年间最快,贫困发生率从30.7%下降到15.1%,年均减贫人口1786万人^[35]。1985年以后减贫速度开始放缓,1986—1990年间的年均减贫人口达到800万,1991—1995年间的平均年减贫人口只有392万^[35],这一时期的农业增长率也从8.0%的高峰下降到4.2%,而工业增长率却从8.1%增加到12.8%^[36]。农民收入放缓与这一阶段减贫速率的下降密切相关,数据显示,农民人均收入在1986—1995年的增长率为3.6%,远低于1978—1985年的15%^[37]。一方面,工业化的发展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来源,拓展了农民的收入结构,农民的非务农收入快速增长,2001—2005年,工资性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34.3%,对这一时期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51.6%^[32],但另一方面,工业化的推进也带来了农村结构不平等的问题,农村地区的基尼系数从1990年的0.31增至2000年的0.35,2005年再次增至0.38^[38]。因此,贫困问题依然会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长期存在,中国的减贫战略和各项社会保障制度也需要保持跟进。

表3 中国的经济增长、农业工业增长与贫困发生率(1970—2006年)^[36]

	1970—1978	1979—1984	1985—1995	1996—2000	2001—2005	2006
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	4.9	9.2	9.7	8.2	9.9	11.1
农业增长率	2.7	8.0	4.2	3.1	4.3	5.0
工业增长率	6.8	8.1	12.8	9.1	11.4	13.0
贫困发生率	30.7(1978年)	15.1(1984年)	7.1(1995年)	10.2(2000年)	6.8(2005年)	6.0

二、新的发展资源

新南南合作兴起的第二个标志是新的发展资源的产生。这主要体现在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投资、国际发展合作的快速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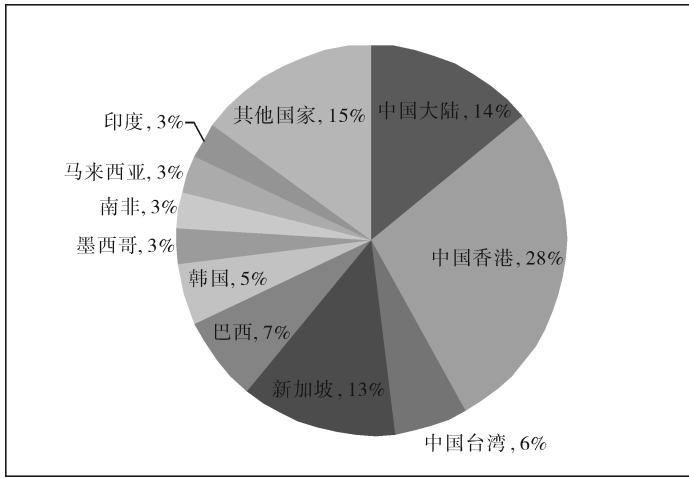
根据IMF的数据统计,近10多年来,南方国家在全球贸易的比重快速增加。其中南方国家的进口额比重从2000年的28%增加到2014年的43%。出口额从2000年全球总出口额的22%增加到2014年的38%。发达国家的相应比重则分别从2000年的72%、78%下降到2014年的57%、62%^[39]。从南方国家内部贸易情况看,南方国家之间的进口额从2000年的29%上升至2014年的48%,出口额从2000年的25%增加到2014年的41%。南北贸易的相应比重则从2000年的71%、75%分别下降至2014年的52%和59%^[39]。南方国家之间的进出口贸易基本与南北方国家的进出口贸易逐渐接近。数据显示,在南方国家中,以亚洲新兴国家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贸易增长最快,其中,中国的贡献最大。由IMF2014年对全球进出口贸易统计的数据可知,中国是143个南方国家中的主要贸易国家。中国是48个南方国家的第一大进口贸易国家,是105个南方国家排名前三的进口贸易国。同时,中国也是33个南方国家的第一出口贸易国,是95个南方国家排名前10的出口贸易国^②。

除了贸易额的增加,南方国家之间的直接投资也在增加。2015年全球投资报告显示,发展中国家的FDI主要来自亚洲国家,中国香港、中国大陆和新加坡向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最多,这三者投资超过了发展中国家FDI来源总额的55%,巴西以7%排在第四。发展中国家(中国、巴西、印度、马拉

① 根据黄季焜在2016年6月26日“中非农业合作助推非洲农业现代化——中非农业发展政策对话”会议报告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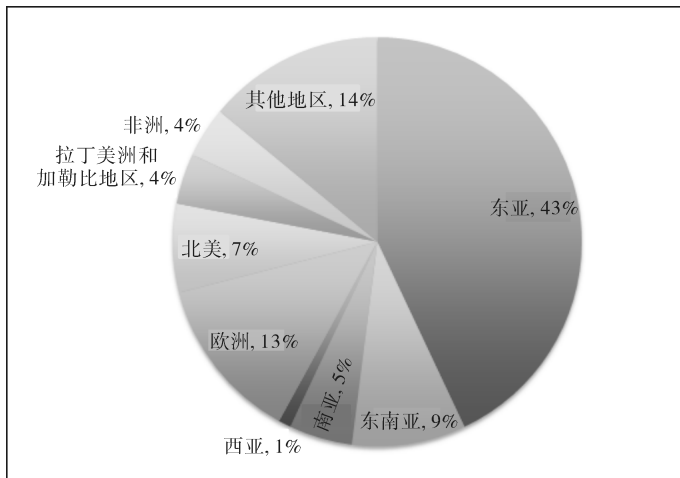
②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CDIS数据库整理。

西亚、墨西哥、南非)总共占发展中国家 FDI 来源的 33%(见图 5)。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地中,亚洲(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占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目的地的 58%,欧洲占 13%,非洲占 4%,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占 4%,北美占 7%(见图 6)。中国大陆是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国家。



注：数据来源于《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5》。

图 5 主要发展中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来源占比



注：数据来源于《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5》。

图 6 发展中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主要目的地占比

2015 年末,中国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为 1 156.8 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 10.5%。存量位列前 10 的国家是:新加坡、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老挝、阿联酋、缅甸、巴基斯坦、印度、柬埔寨^[40]。

在国际发展援助上,南方国家也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南方新援助国家的国际发展援助金额在逐年增加。其中,中国已经是南方国家中最大的援助提供国,中国的官方发展援助支出远超过金砖国家的印度、巴西和南非;印度居于中国之后成为金砖国家中第二大援助支出的国家(表 4)。

由上可知,无论在贸易、投资、发展援助方面,中国的表现最引人注目,中国已经成为新的全球发展资源的主要供给者。新的全球发展资源也为新南南合作的兴起提供了物质保证。

表 4 2005—2010 年金砖国家发展合作优惠流动(类官方发展援助)金额估算

百万美元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中国	911.90	1033.27	1466.86	1807.57	1947.65	2010.61
印度	414.50	381.40	392.60	609.50	488.00	639.10
巴西	158.10	277.20	291.90	336.80	362.20	923.00
南非	42.00	49.10	85.20	89.20	119.50	98.40

注: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IPEA, 缺少俄罗斯数据。

三、新的发展制度

当前的全球发展被看作是起源于西方发展制度^[8]。学界对于西方发展制度的反思与批判的研究层出不穷,这使得批判反思西方的发展制度也成为西方知识生产的一个强项。南南合作就是被看作反思与批判西方发展制度的一个典型的概念。然而在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中,南南合作的思想并没有超越西方发展制度形成替代性的发展知识与制度,而是在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影响下曲折发展,直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才为南南合作带来了复苏,并为南南合作作为一种新的发展制度创造了条件。

2004 年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出版了美国《时代》杂志高级编辑乔舒亚·库珀·雷默写的《北京共识》,“北京共识”强调了知识创新推动的中国的自主发展经验。这篇文章在中外产生了很大的震动,文章指出两个最无视华盛顿共识的国家——印度和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而诸如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亚等华盛顿共识的忠实追随者却付出了社会和经济的代价^[41]。这标志着西方主流社会开始承认中国为首的南方国家的发展经验。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同一年,2004 年联合国大会决议通过了“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专门单元”正式改名为“南南合作专门单元”。南南合作的官方概念正式诞生,联合国对南南合作的定义为“南方发展中国家之间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和技术领域合作的一个广泛的框架。涉及两个或多个发展中国家,可以以双边的、区域的、次区域的或跨区域的合作为基础。发展中国家通过共享知识、技能、专家和资源以实现其发展目标。”并指出,南南合作的基本精神是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发展;南南合作的指导原则是“尊重国家主权、国家所有权与独立,平等与无条件,不干涉内政,互惠互利”。此外,南南合作还鼓励三方合作,即传统援助国家与其他多边组织通过提供资金、培训和管理技术等形式以支持南南合作的倡议被称为三方合作。2005 年,在第一次亚非会议万隆会议召开 50 年之后,近 50 个亚非国家的领导人出席了由印尼和南非共同主办,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举行的亚非峰会。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会上提出构建亚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的四方面设想。会议发布了《亚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宣言》,提出亚非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安全四大领域的全面合作。联合国南南合作专门单元的成立与亚非国家领导人的再聚首标志着南南合作的复苏。南南合作的复苏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崛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也与全球化的形势发展息息相关。此时的南南合作延续了独立自主、平等互惠的万隆精神,但其广度和深度已经比万隆会议时期和 77 国集团时期要深刻得多,此时的南南合作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各个领域,合作方式也拓展至三方合作,强调南方国家之间的发展知识分享。这些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和快速发展。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经合组织 OECD 国家陷入经济持续低迷,中国、印度为首的金砖国家经受住考验,继续保持增长。南南合作作为一种新的国际合作范式开始受西方发达国家的重视。经合组织(OECD)开始承认南南合作的地位,并在 2008 年专门成立了南南合作任务组,国际合作正从北方-南方国家的“援助者—受援者”的关系转变为不同层级行动者之间资源和知识共享的关系。南方和北方的合作方式正在融合。中国开始在全球治理的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2016 年中国在联合国的会费分摊比例达到 7.921,取代了一直以来稳居第三的德国的位置。数据显示,除了美国的会费分摊比例一直保持在稳定的第一位置,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等大国的会费比例近十年来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而巴西、俄罗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会费则在稳健上升(见表 5)。中国在世行的投票权上升到

第三的位置以及2016年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都体现了二战以来所形成的国际发展秩序正在重新排序。

表5 联合国会费主要贡献国家分摊比例(2007—2017年)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
美国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日本	16.624	16.624	16.624	12.53	12.53	12.53	10.833	10.833	10.833	9.68	9.68	
德国	8.577	8.577	8.577	8.018	8.018	8.018	7.141	7.141	7.141	6.389	6.389	
中国	2.667	2.667	2.667	3.189	3.189	3.189	5.148	5.148	5.148	7.921	7.921	
英国	6.642	6.642	6.642	6.604	6.604	6.604	5.179	5.179	5.179	4.463	4.463	
法国	6.301	6.301	6.301	6.123	6.123	6.123	5.593	5.593	5.593	4.859	4.859	
意大利	5.079	5.079	5.079	4.999	4.999	4.999	4.448	4.448	4.448	3.748	3.748	
加拿大	2.977	2.977	2.977	3.207	3.207	3.207	2.984	2.984	2.984	2.921	2.921	
西班牙	2.968	2.968	2.968	3.177	3.177	3.177	2.973	2.973	2.973	2.443	2.443	
俄罗斯	1.200	1.200	1.200	1.602	1.602	1.602	2.438	2.438	2.438	3.088	3.088	
巴西	0.876	0.876	0.876	1.611	1.611	1.611	2.934	2.934	2.934	3.823	3.823	

注: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官网。

2015年9月26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的南南合作圆桌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①。从习近平的讲话可以发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不干涉内政、互利互惠”是万隆会议时就强调的内容,是对万隆精神的继承。重申不结盟运动、77国集团机制的作用承认了万隆会议之后的南南合作的延续性。照顾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特殊需求,表现了南南合作对联合国一直以来的支持不发达国家的减贫和发展主题的拥护。“秉持义利相兼、先义后利的正确义利观,将他国发展当作自身机遇,不追求利益最大化和我赢你输的零和模式。互通有无、优势互补,联手开发国际市场,全面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共同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争取有利地位”是新增的内容。这两句话虽然简短,但却意义重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义利观是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儒家文化义利观在全球化时代的再解读——将“他国发展当作自身机遇,不追求利益最大化和我赢你输的零和模式”。这是对过去百年来发生全球金融危机时,大国、强国转嫁危机于弱国、小国导致全球不平等进一步加深的教训的深刻反思。不追求利益最大化和我赢你输的零和模式,挑战了资本主义追逐利益最大化的本质,也暗示了对丛林法则和强弱对立的二元结构的摒弃。这句话是对南南合作经济伦理和哲学基础上的声明。“互通有无、联手开发国际市场,全面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共同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争取有利地位”。这句话是对实现南南合作的方法上的说明,强调优势互补,优势互补,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变革。“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就是上述思想和方法的体现。

此外,基于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经验,中国的经济学理论也开始受到国际主流的认可,中国的经济学家林毅夫提出的全球基础设施倡议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得到承认^[24],他提倡的“新结构经济学”强调基于国家资源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和赶超发展的理论也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2016年20国集团杭州峰会标志着以“中国方案”为代表的南方国家的发展主张正在逐渐成为全球发展的重要替代。中国总理李克强在联合国大会的一系列会议上提出的中国主张进一步展示了南

① 讲话的内容为:“政治上,我们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相互不干涉内政,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经济上,我们尊重对方意愿,不强人所难,不乘人之危,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南南合作是互利共赢的合作。我们秉持义利相兼、先义后利的正确义利观,将他国发展当作自身机遇,不追求利益最大化和我赢你输的零和模式。我们互通有无、优势互补,联手开发国际市场,全面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共同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争取有利地位。南南合作是团结互助的合作。我们通过不结盟运动、七十七国集团等机制保持沟通和协调,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捍卫正当权益,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我们照顾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特殊需求,向他们提供援助,帮助他们提高自身发展能力”。

方国家在国际发展政治上的成熟。可以说中国的方案和主张正在使南南合作的视野和架构得到前所未有的拓宽,使得南南合作的发展经验、发展资源分享得以实现,也使得南北合作和三边合作成为可能。

四、结 语

综上所述,“新南南合作”指的是新的发展经验、新的发展资源和新的发展制度下全球发展方式。这个制度继承了南南合作中不干涉内政的政治遗产,同时在新的全球发展时期强调国家需求导向、互利互惠原则。“新南南合作”为全球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经验,强调结合本国国情,在不断学习与纠错中发展,强调农业增长、基础设施先导和减贫效益。“新南南合作”为全球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资源,强调贸易、投资和援助三者结合。“新南南合作”维护全球化的发展成果,并在此基础上为建立新的全球发展制度提供了一个开放的方案。

参 考 文 献

- [1] AGHAZARIAN A W.The people of Asia and Africa: the bandung conference and the southernis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1955-1970[EB/OL].(2012-05-16)[2017-04-20].https://ses.library.usyd.edu.au/bitstream/2123/8623/1/Aghazarian_a_History%20Thesis_S1_2012.pdf.
- [2] DIRLIK A.The bandung legacy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lobal modernity[J].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2015,16(4):615-630.
- [3] GRAY K,GILLS B.South-South Cooper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global south[J].Third world quarterly,2016,37(4):557-574.
- [4] HENDERSON W.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ism in Southeast Asia[J].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55,19(4):462-470.
- [5] IRVIN G.ECLAC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central American common market[J].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1988,23(3):7-29.
- [6] KARSHENAS M.Powers,ideology and global development :on the origins, evolution and achievements of UNTAD[J].Development and change,2016(10):664-685.
- [7] PHILLIPS A.BeyondBandung :the 1955 Asian-African Conference and its legacies for international order[J].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2016,70(4):329-341.
- [8] RIST G.The history of development :from western origins to global faith [M].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0.
- [9] SAMIR A.Deployment and erosion of the bandung project[EB/OL].[2016-08-30].http://www.bandungspirit.org/IMG/pdf/Bandung_deploy_and_erosion_E.pdf
- [10] TOYE J.Assessing the G77:50 years after UNCTAD and 40 years after the NIEO[J].Third world quarterly,2014,35(10):1759-1774.
- [11] 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N].人民日报,1950-06-30(01).
- [12] 王瑞芳.土地制度与中国乡村社会变革——新中国成立初期土改运动为中心的考察[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 [M]//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五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177-180.
- [14]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1981[J].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1.
- [15] 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16-43.
- [16] 中国网.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政策演进文件实录[EB/OL].(2008-04-09)[2017-04-08].http://www.china.com.cn/aboutchina/datta/zgncggkf30n/2008-04/09/content_14684460.htm.
- [17] 黄宗智.家庭农场是中国农业的发展出路吗[J].开放时代,2014(2):176-194.
- [18] 黄季焜.中国农业的过去和未来[J].管理世界,2004(3):95-111.
- [19] 孔祥智,何安华.60 年来我国农民对国家建设的贡献分析[J].中国农村科技,2009(9):27-29.
- [20] 赵士刚.“大跃进”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陈云经济思想及其意义[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3):19-26,125-126.
- [21] 魏后凯.中西部工业与城市发展[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104.
- [22]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1995[J].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55.
- [23] 中国水利年鉴编辑委员会.中国水利年鉴 1990[J].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90:659.
- [24] 林毅夫,王燕.超越发展援助:在一个多极世界中重构发展新理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 [25] 周干峙.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发展研究战略第一卷:中国城镇化道路的回顾与质量评析研究[M].北京:中国建筑出版社,2013:

24-48.

- [26]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EB/OL].(2001-04-28)[2017-04-08].<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252/5089/5103/5206/20010428/454999.html>.
- [27] 虞和平.中国现代化历程[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 [28] 中国乡镇企业年鉴 1993 [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3.
- [29]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EB/OL].(2011-11-09)[2017-04-08].http://www.gov.cn/zhengce/2011-11/09/content_2619445.htm.
- [30] 国家统计局.2015 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EB/OL].(2016-04-28)[2017-04-08].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604/t20160428_1349713.html.
- [31]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12[J].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
- [32] 宋洪远.中国农村改革三十年[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
- [33] 李小云,于乐荣,齐顾波.2000—2008 年中国经济增长对贫困减少的作用:一个全国和分区域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0(4):4-11.
- [34] RAVALLION M.Are there lessons for Africa from China's success against poverty? [J].World development,2009(2):303-313.
- [35]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
- [36] 黄季焜.制度变迁和可持续发展——30 年中国农业与农村[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
- [37]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1999[J].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
- [38]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发展中消除贫困[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7.
- [39]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DOTS 数据库 [EB/OL]. [2016-08-30]. <http://data.imf.org/?sk=9D6028D4-F14A-464C-A2F2-59B2CD424B85>.
- [40]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15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R].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30.
- [41] 舒亚·库珀·雷默.北京共识[M]//黄平,崔之元.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51.

(责任编辑:金会平)